

爱的烦恼：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及其机制

田 杰, 余秀兰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代际教育支持和代内教育帮扶均是家庭形塑个体教育轨迹的有效途径, 但后者常被忽视。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超越父代教育支持的局限性, 激活上大学兄姐的独特优势, 使同代家庭成员获益。本研究将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置于家庭本位的传统文化与个体本位的现代文化相碰撞的中国情境下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在发挥拓宽弟妹向上流动渠道、减轻父母教育负担、促进自我提升的教育代理补偿的积极效应之时, 也衍生出非预期后果, 致使弟妹形成路径依赖心理, 父母转嫁责任成为甩手掌柜, 其自身负荷过重而发展受阻。这折射出家庭内部缺乏有效协作, 教育帮扶合力尚弱, 第一代大学生因过度教育帮扶陷入爱的烦恼。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是促进教育公平在微观层面实现的必要行动, 其中夹杂着父母无法给予子女增益的文化资本之无奈, 也暗含着仅有的“先改写者”补偿文化资本之可能。然而, 在发挥其积极功能时, 也要减少其衍生的非预期后果, 规避不利影响。

关键词: 第一代大学生; 代内教育帮扶; 积极效应; 非预期后果; 教育公平

The Trouble of Love:

The Effect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and Its Mechanism

TIAN Jie, YU Xiul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support and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are effective ways for families to shape children's educational trajectory, but the latter is often neglected.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which is beyond the limitations of parental education support, can benefit intragenerational family members by activating older siblings' unique advantages. The study explores influences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featured with the collision between family-base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dividual-based modern 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not only exert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ducation agent compensation by widening younger siblings' channels of upward mobility, reducing parents' education burden, and promoting self-improvement, but also leads to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As a result, younger siblings form path dependence psychology, parents transfer responsibility, and their own development is blocked due to the overload of assistance. It reflects the lack of effective coordination within families, weak joined force in education assistance, and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excessive education assistance trapped in the trouble of love. As a necessary action to promote the micro-realization of education equity,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is mixed with the fact that parents

cannot give their children beneficial cultural capital, and also implies the possible cultural capital compensation from the only "first rewriter". However, when playing its positive functions, we should also reduce it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avoid adverse effects.

Keyword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ragenerational education assistance; positive effect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education equity

一、问题的提出

金秋九月正值高校开学季,信阳师范学院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特别的迎新报道,惹人注目。一位姐姐在弟弟成长之路上扮演“引路人”角色,姐弟二人相伴相扶,指引同行,相继在同一学院和专业追梦^[1],呈现出先“上”带后“上”的代内教育帮扶之现实图景。兄弟姐妹之间拥有家庭最亲近、最深厚、最持久的关系纽带,是家庭层面影响个体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2]。张谦指出,在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兄弟姐妹之间强有力的支持关系可以调动更多异质性社会资源,他们比父母更能帮助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和地位提升^[3]。姐姐对弟妹的积极影响在第一代大学生^①家庭内部尤为显著^[4],因为他们的父母缺少必要的文化资本,无法为子女提供向高等教育过渡所需的足够信息和资源^[5],而第一代大学生在求学之旅中累积了文化资本,可以成为衔接家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文化桥梁^[6],通过日常课业辅导、信息传递等方式提升弟妹的教育成就,代内共享与传递文化资本^[7]。

第一代大学生常被视为家庭教育支持的接受者,而他们反向促进家庭教育再造的帮扶者角色鲜少得到关注。正如父母作为经验管理者和教育支持提供者,作为兄姐的第一代大学生也可能对弟妹产生类似的影响^[8],他们代表家庭额外的教育资源,促进家庭资源再造与资本累积^[9]。由第一代大学生提供代内教育帮扶是“可能”与“可为”的,因为他们具备帮扶的能力且回馈家庭的意愿更为强烈。尼科尔·斯蒂芬斯等学者调查发现,69%的第一代大学生认为上大学是为了帮助家庭,而仅有39%的非第一代大学生声称上大学是为了帮助家庭^[10]。这在家庭本位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我国亦是如此,回馈家庭对于跃出农门的寒门子弟而言,几乎是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11]。他们懂得父母为自己实现向上流动的辛苦付出和巨大牺牲,感激父母沉甸甸的爱意,并将其转化为顽强奋斗的动力,以期用学业成功报答家庭爱的供养^[12]。待到实现社会阶层流动之时,他们便基于家庭责任、义务与亲情的内

在逻辑,发挥“提升机”的功能,竭力扶持并带动后进的家庭成员实现链式流动^[13]。

尽管有研究关注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功能,如为同代家庭成员树立教育榜样、培养上大学惯习、强化上大学动力、实现家庭“大学生成窝”的教育愿景^[14],但这似乎是指向弟妹教育发展的单向度研究,尚不清楚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对父母及其自身存在何种影响,未从角色身份与行动维度对其加以考察,也未进一步明晰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及其机制,以期全面勾勒代内教育帮扶的现实图景,深度解读代内教育帮扶现象,为新时期整合与利用家庭代内现有资源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新的路径。本研究重点关注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对弟妹、父母及其自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

二、文献综述

教育社会学研究重视家庭对个体教育发展的影响,但主要考察父代教育支持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同代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影响并非学者关注的主题,也较少被视为教育同伴关系^[15]。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兄弟姐妹在创造家庭文化资本和形塑个体高等教育轨迹方面的作用常被忽视。尽管有研究考察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影响,但并未取得一致结论。究其根源,一方面,这种影响存在内生性和交叉性,很难精准测量;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较为复杂,可能是促进作用,可能是抑制作用,也可能是杂糅的混合作用。

早期研究将兄弟姐妹视为家庭资源的竞争者和消耗者,认为其对个体教育发展存在此消彼长的挤压和抑制作用。这种主张以资源稀释理论^[16]为支撑,被归因于家庭资源的刚性约束和性别选择偏好,衍生出经典的“教育挤占说”视角,表征了兄弟姐妹之间教育结果的分化趋向,是教育不平等在家庭微观层面的重要投射。大量实证研究揭示了兄弟姐妹在个体教育获得方面存在同胞竞争效应^[17]。如马特希斯·卡莱米

恩等学者通过对欧洲18个国家儿童的调查发现,个体教育获得与家庭规模负相关,兄弟姐妹可能抢占有限的家庭资源,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对资源的稀释作用越大,个体分得的教育资源越少,且这种资源稀释存在性别差异,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教育挤压效应的影响^[18]。我国学者钟粤俊等基于多个微观数据也得出类似结论,即兄弟姐妹对个体教育产生挤占效应,且女孩遭遇的教育挤占效应比男孩更大^[19]。

产生于研究中期的“教育溢出说”主要阐释兄弟姐妹对个体教育发展的积极效应,论证兄姐在弟妹择校过程中充当信息来源和经验指导者,弥补父母因文化资本匮乏而无法帮助子女择校的不足^[20],并通过影响弟妹的教育愿望、分享大学成功策略以及提供情感支持增加弟妹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21]。约瑟法·阿吉雷将智利13年的大学申请记录中的兄弟姐妹信息联系起来,并利用准随机匹配的方法将兄姐分配到研究项目中,证实了兄姐对弟妹的高等教育选择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在择校方面,如果兄姐进入某所大学,则弟妹跟随他们的脚步进入该大学的可能性增加42%^[22]。袁璐璐、罗楚亮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2013年和2018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论证了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在两孩家庭和城镇家庭内部,长子(长姐)、相同性别以及年龄差距为4-6岁的兄弟姐妹之间更为显著^[23]。

在“教育挤占说”和“教育溢出说”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混合说”避免从单一视角考察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影响,兼顾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大卫·劳森利用英国一项大型家庭代际追踪调查的数据证实,兄弟姐妹数量与儿童心理健康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兄弟姐妹的存在不会通过减少父母的时间投入而降低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因为兄弟姐妹通过其他方式抵消了其对父母资源稀释的负面影响。年长的兄姐保障弟妹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中成长,更有利于弟妹的心理健康发展和教育获得^[24]。我国学者也有一致发现:聂景春等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西部农村儿童的调查数据后发现,兄弟姐妹数量与儿童心理健康以及学业表现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随着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儿童在心理健康和学业表现方面大致呈现出先变好后变差的态势,而有1个兄弟姐妹是这种变化趋势的平衡点或拐点^[25]。显然,“教育混合说”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充分考虑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复杂影响,尽可能纳入其所涵盖的多重因素和作用机制,为考察兄弟姐妹对个体

教育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解说路径。

综上所述,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影响较为复杂,且尚未得到统一言说,但无论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都是探讨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时难以规避的议题。然而,此类影响研究多从兄姐指向弟妹,从弟妹到兄姐以及从兄姐到父母的影响研究较为稀少。此外,如何发挥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积极作用,在家庭内部形成畅通的知识流和信息通道,增加弟妹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家庭成员的向上流动,从而构建个体获益于家庭整体的教育公平机制是新时期值得关注的重要主题。随着我国生育政策从“二孩”到“三孩”的变迁,多子女家庭逐渐增加,可能将有更多孩子需要处理兄弟姐妹关系。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互动与影响极其必要且正当其时。与此同时,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结果之复杂,作用对象之多元,产生逻辑之深刻,现有研究却鲜少关注这种影响及其发生机制,也未对其予以深刻阐述与描绘。本研究将试图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构建新时期我国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现实图景。

三、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考察对象主要是高校在读的、多子女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②。通过采用目的性抽样、异质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式,借助半结构访谈法,从2021年1月至8月,笔者陆续调查了35名在读的第一代大学生(包括25名兄姐和10名弟妹),借以考察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虽然这些研究对象并非都是完全匹配的兄弟姐妹关系,但其中也有5对来自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这使本研究的结论更具可靠性和科学性。访谈内容涵括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与作用、实施代内教育帮扶的过程与感受、接受代内教育帮扶的经历与体悟,以及对代内教育帮扶的认识与理解等问题。

在选取受访对象时尽可能考量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多样化和典型性。具体来说,研究对象以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为主,也包括少数城市第一代大学生;学科背景涉及管理学、历史学、教育学、英语、哲学、医学、机械制造等专业;性别以女生为主(女生21人,男生14人);生员来自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和3所非“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生27人,研究生8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访谈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形式开展,线下主要进行面对面访谈,线上则使用微信

视频的方式开展,平均访谈时长为1.5小时。在征得受访对象同意的基础上对访谈内容进行全程录音,事后整理成文字访谈稿,并针对遗漏内容进行再次访谈和追问,共计形成30余万字的访谈稿。所有受访对象均为有实施代内教育帮扶(兄姐)或接受代内教育帮扶(弟妹)经历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故事叙说呈现并勾勒了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图景,揭示出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复杂影响和作用机理。

(二)数据分析

基于学术伦理原则,本研究对访谈对象进行匿名编号处理。其中,O代表提供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兄姐,Y代表接受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弟妹,M代表男生,F代表女生。通过持续比较分析验证,确认不再有新的信息出现,表明访谈的样本量达到信息饱和的要求。为了科学有效地处理访谈数据,笔者使用分析归纳法,并借助NVivo12软件对其进行整理、提炼和编码。首先,在反复阅读访谈资料的基础上,把握访谈资料的整体内容和具体细节,形成对于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影响的初步认识。其次,通过聚焦访谈对象的代内教育帮扶经历与感悟,根据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主体(兄姐)、客体(弟妹)、中介体(父母)的感受差异,对访谈数据进行贴标签和分类,捕捉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过程中存在的家庭矛盾与冲突。再次,从角色身份与行动维度考察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具体影响。最后,从家庭本位文化与个体本位文化碰撞的视角深入探讨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机制。

四、爱的烦恼: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双重效应

尽管现有研究表明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对弟妹具有积极作用^[26],但并没有进一步回答代内教育帮扶对父母及其自身是否存在积极作用,也没有指明这种积极影响背后是否存在“暗面”。本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对弟妹、父母及其自身都可能产生积极效应,但也受到外力的撕扯和推拉,引发家庭场域的教育冲突与对抗,并衍生出一系列非预期后果,而这往往是隐而不彰的。

(一)心之所愿:实现家庭教育再造的积极效应

1.“一定要上大学”:享有增益的受扶者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逻辑起点是在父母文化资本缺乏的背景下,传递其所累积的文化资本和信息资源,使正在接受教育的弟妹获益。调查发

现,第一代大学生通过榜样示范、知识传递、资源供给、矛盾调和等方式为弟妹提供教育支持,这种同代间的教育帮扶可被视为父代教育代理补偿的形式。相应地,弟妹在上大学兄姐的帮扶下,树立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力,端正学习态度,专心投入学习,提高学习成绩,获取叩开高等教育大门的关键“钥匙”。上大学兄姐的教育轨迹也在无形之中塑造了弟妹的人生规划^[27]。对于弟妹来说,上大学兄姐是挣脱家庭经济条件禁锢的“先改写者”,在家庭内部建立起上大学的教育传统,改变了他们的教育认知,上大学便成为他们人生之路的不二选择。“我哥上大学以后,我就觉得我也应该上大学。如果家里没有人考上大学,我可能努力上个学就行了,也不一定要上大学。但现在我哥已经上大学了,我怎么能不上大学呢?他已经给我指好了前进方向,最好的路就在这里,我怎么能不走?其实不用选,我就已经必须要走这条路了。”(YF2)

通过提供代内教育帮扶,第一代大学生的角色支持、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汇聚于弟妹的教育进程。选择遵从兄姐教育道路的弟妹,其学业发展也因此得到提升,教育轨迹随之得以改善。显然,接受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弟妹在激烈的学业竞争中更具比较优势,上大学兄姐既是学习榜样,又是可以寻求支持和建议的“贵人”,他们从兄姐身上获取从父母那里难以得到的隐性知识和教育经验^[28],如文理分科、高考志愿填报、未来职业规划、大学课程选择、大学生活安排等,以此节约探索和试错的时间,少走弯路。这些排他性竞争资源帮助他们获得便捷的教育通道,减少教育风险和障碍。“从小到大一直是我姐带着我走的,相当于她在前面给我探路和铺路。基本都是她给我安排学习和生活,这样我就很省事。我的上学规划比其他人更清晰,学习目标也比较明确,中考择校、学文学理、填报大学和专业等方面的建议都可以从我姐那儿得到。”(YM8)

2.“风雨同舟偕行”:如释重负的教养者

尽管父母并非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直接对象,但他们却是间接受益者,如减轻教育子女的压力、形成科学的教育理念。教导子女成才是父母责无旁贷的要务,但是第一代大学生的父母却面临教育难题——他们或无法为子女提供必要的文化资本,或无法分出多余的精力提供教育支持,或不知何种教育方法最为科学^[29]。他们还被“全球教育焦虑的时代”所裹挟,在焦虑之际,失落彷徨而又手足无措,迷失在家庭教育里。在此现实困境下,第一代大学生满足了父母渴求有经验者为教育子女指点迷津的心理需求,以

及帮助家里实现“再出一个大学生”的迫切愿望,他们积累了父母所缺乏的文化资本与隐性知识,借此填补家庭结构性因素带来的短板。“我上大学后,父母觉得我接受的文化知识比他们多,接受的教育也比他们好,教育想法也比他们的老想法好,再加上我弟比较听我的话,他们就想让我帮忙教育我弟。于是,我接替了父母的教育工作,这样他们也比较轻松。”(OM17)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为高等教育赤贫的原生家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拓展了同代家庭成员向上流动的渠道,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父母的双肩,使其如释重负。在许多来自底层家庭的父母眼中,孩子考上大学代表着拥有读书人的知识与能力,意味着其在教育方面强过自己,而这恰是他们所欠缺的。正因如此,有些第一代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便在家里获得了“话语权”,化身为父母的“参谋官”,得以参与家庭事务决策。甚至父母遇到任何重大事情,包括仍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子女存在的教育问题,都会首先咨询和参考他们的意见,希望其帮忙分担教育子女的责任。“我把很多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样我妈就会轻松一点。以前我妈遇到我弟学习上的问题,她就会不知道怎么办,特别烦,有时候在家吃不下饭,甚至还会焦虑得生病。现在就很好,她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讲,我会开导她,努力帮她解决。她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有风雨同舟的人了。”(OF10)

3.“乐教其中”:自我促进的帮扶者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实则是一个互相促进、相互成就的“双赢”过程,即上大学兄姐在帮助弟妹实现教育发展的同时,自我也有所进步与成长。具体而言,为给弟妹树立榜样和起到表率作用,第一代大学生需要以身作则,反观自身的行为和表现,时刻警醒自己,不敢有丝毫懈怠,尽最大努力完成学业,取得荣誉和奖励;为更好地帮扶弟妹,第一代大学生需要合理规划自己的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做到自我学业和弟妹学业之间的良好平衡,这些都会反向激励其提升自我。“有时候教育他们也是教育我自己,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我天天指着他们说‘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但如果我天天这样做,我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们?所以我有时候也尽量改正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反观自己,改进自己的问题。”(OF2)

对于第一代大学生来说,代内教育帮扶还是他们收获内在成就感和满足感的重要方式。倘若弟妹在其帮助之下取得进步或拥有好的前程,这无疑是对其

付出得到回报的最好表征。将弟妹的外在成就获得内化为自我情感满足,超越了兄姐与弟妹之间的血缘联结关系,把身份彼此独立的个体串联成相互依偎的家庭共同体,融入于社会化发展过程之中,实现了家庭亲情-个体成长-社会参与的完美契合。在访谈过程中,OF4兴冲冲地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她的弟弟这学期在她的辅导下考进班级前三名,有机会进入重点班。“看到他在我的帮助下取得了进步,我就感觉非常高兴,也有动力去干我自己的事情了。”(OF4)此外,第一代大学生也通过代内教育帮扶积累了教育实践经验,形成了清晰的自我认知,有些甚至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在帮助妹妹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性格比较适合教师职业,未来我想要当一名教师,这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事情。虽然我的性格并不是十分外向,但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给别人讲题,给别人讲题的时候我会很开心,我也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帮助别人解决疑难问题。”(OM8)

(二)事之所衍:制造离析隔阂的非预期后果

1.“想要效仿”:形成路径依赖心理

弟妹尽管可以从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中获益颇多,但也容易养成过分依赖他人的陋习,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扶“知”与扶“志”需要同行。若第一代大学生在代内教育帮扶过程中,只注重弟妹的知识帮扶,而忽视心志帮扶,极易造就大批自主性缺位的路径依赖者——在面临教育选择时,他们依然亦步趋,遵照兄姐的教育轨迹,选择自己的教育道路或职业规划。事实上,很多弟妹对自我发展道路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与判断,面对未来,他们更多的是茫然和懵懂。此时上大学的兄姐于他们而言乃是“先行者”般的存在,效仿兄姐的成功行为和道路选择乃是最为稳妥和保险的方式。然而,过度模仿极易使弟妹形成路径依赖心理,丧失独立自主性。“我觉得代内教育帮扶不好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会变得有点懒,对我姐产生一种依赖感。因为我已经习惯了遇到事情有她帮我解决,碰到任何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我姐,而不会想到自己要先试试能否解决。”(YM10)

有些弟妹习惯于接受兄姐的教育帮扶,在教育抉择过程中自主性缺位,甚至想要“复制粘贴”兄姐的人生。这种路径依赖心理是不可取的,亦是有害的,同时也加重了兄姐的心理负担。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OF21被戳中了心事,一度真情流露,双眼泛起泪花。她哽咽谈道,尽管与弟弟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她现在十分担忧弟弟因过分依赖她而丧失自主意识,什么

事情都不敢自己做决定,总是跟在她后面踱步,这于她而言是一件非常可怖之事。“从小到大我的各种喜好,比如学舞蹈和上英语兴趣班,我弟都会跟在我后面去学,虽然他不是很喜欢,但他还是学完了。我的生活轨迹和学习轨迹,他都会一步一步跟随,跟得还是比较紧的。甚至我考大学想当老师对他也有影响,那段时间他也想上师范大学当老师,照着我的理想去模仿和跟随。”(OF21)

2.“甩锅给你”:变身甩手掌柜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在减轻父母教育负担的同时,也造就一批过度转移子女教育责任的甩手掌柜,他们将教育子女的责任完全“甩锅”给第一代大学生,美其名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显然,父母这种不断往第一代大学生身上加压加码、希望他们来教养其他子女的做法,既不现实,也不明智,使其承受过重压力,也造成后面子女教育过程中的父母缺位。“我妈可能在我的教育上耗费精力比较多,我上大学以后,她对我弟的教育反而没那么上心了,也可能是精力用尽了,没那么多精力去管教他,所以我妈把教育他的责任转移到我身上,希望我管教我弟。”(OF11)

与此同时,成为甩手掌柜的父母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教育期望:一种是拔高教育期望,全然不顾孩子的实际情况,试图将后面子女的教育期望完全寄托于第一代大学生,让他们实现“力拔山河”的教育壮举,以揠苗助长的方式把后面的孩子也送进大学;另一种是降低教育期望,由于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耗费了大量的心力,再加上从第一代大学生身上获得了教育期望补偿,因而对后面子女的教育发展容忍度变高,即使他们的学业表现不尽人意也能接受,完全不想再费心思教育子女,只想把教育子女的责任转嫁给第一代大学生。“我爸妈可能觉得家里已经出了一个大学生,对我妹的学习投入不够多,对她的教育期望也在不断降低。她考试没考好,也不会责怪她,但我那时候没考好是要挨打的。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们一直督促我学习。但现在,他们觉得我来做这些就可以了,有学习问题就让她直接来问我,让我看着她做作业,讲解她不懂的地方。开家长会的时候,如果我在家就让我去;如果我不在家,也让我打电话与老师沟通。”(OM1)

3.“一人扛下所有”:无法逃脱烦恼挣扎

尽管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有助于促进弟妹学业发展,减轻父母教育压力,但他们亦要为此付出代价,深陷爱的烦恼。首先,代内教育帮扶阻碍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挤占学习时间、强

占学习注意力、分散学习精力以及中断学习过程。“疫情期间我在家上网课,老师布置很多作业。有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要去辅导我妹的功课,这样我哪里还有心思做自己的作业!”(OF12)其次,代内教育帮扶使第一代大学生承受过重的心理负担,体验到多种消极情绪,如排斥抗拒、矛盾纠结、担忧害怕、烦躁难过、心累倦怠、无力挫败感,甚至产生不良的应激反应,这些消极情绪交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他们束缚于其中,困顿挣扎却无法解脱。“有时我妹的事情突然来了,我又无法很好地帮忙解决,这就会影响我的心情。虽然这种影响时间不长,但是会严重影响我当下的心情,可能一些事情就没有心思去做了。”(OF23)

再次,代内教育帮扶降低第一代大学生的社会认知,使其陷入自我怀疑,人生意义感被削弱。“教育我弟严重影响自我判断,我有时甚至觉得他学不会是我的问题,我不会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没能教好他。”(OF20)“我觉得我的人生价值感都降低了。一开始我觉得帮助亲人很有使命感,觉得我好厉害,但我反复试了很多方法也教不会他,后来就直接放弃了。”(OF18)最后,代内教育帮扶降低第一代大学生的未来发展预期,甚至疏远亲子关系与同胞关系。“我现在有点儿后悔选择师范类专业。我连我弟都教育不好,还怎么教育别人家的孩子?”(OF14)“原本只是聊聊天、分享零食的和谐关系,经过辅导作业和学习后,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得剑拔弩张、随时红眼。父母还在一旁批判我,觉得我发脾气是不对的,没有好好辅导他学习,不够用心。我听了非常闹心。”(OF15)

五、寻根溯源: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双重效应何以产生

上述分析表明,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是一个冠以爱之名的甜蜜与烦恼交织的过程,既给弟妹、父母、兄姐三大家庭利益主体带来积极效应,又对其造成消极影响。那么,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复杂影响何以产生?本研究尝试从角色身份与行动维度,以及家庭本位和个体本位相冲突的文化视角对其进行探讨,以呈现家庭场域中成员之间的互动情况与第一代大学生的帮扶困境(见图1)。

具体而言,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通过知识传递、资源供给、榜样示范和矛盾调和等方式发挥教育代理补偿作用,在实践中形成两条截然相反的影响路径。第一代大学生在道德责任的驱使下,提供代内教育帮扶,使弟妹享有教育增益,父母如释重负,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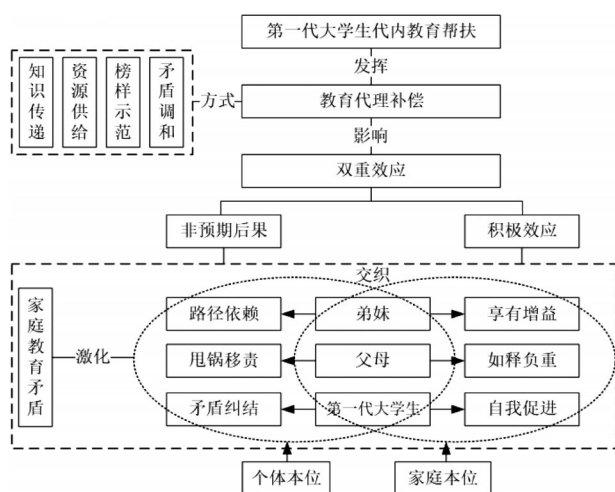


图1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机制

获得提升。然而,由于缺少父母和弟妹的积极参与和配合,第一代大学生身负家庭重任而又孤立无援,过度帮扶却又无力托举弟妹的明天,亦无法完成父母拔高的教育期望,进而滋生矛盾纠结的心理。作为受扶者的弟妹可能消极配合兄姐的教育帮扶,他们或过度依赖兄姐,或抗拒兄姐,接受帮扶的意愿较低,家庭矛盾由此激化,家庭成员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父母本应与第一代大学生合作共育,但他们过度转移责任的“甩锅”行为致使后面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父母缺位。这折射出第一代大学生在过度教育帮扶、家庭负荷过重、面临自我发展困境的同时,又被道德“绑架”而被迫实施代内教育帮扶,整个过程充满烦恼和无奈,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家庭矛盾与冲突。

显然,这种由代内教育帮扶引发的家庭冲突,从深层次映射了在家庭本位与个体本位两种文化观念的碰撞与较量之下,第一代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与行为抉择面临着动荡和困惑,始终游离在个体发展与家庭提携之间,却难以在提升自我与帮扶弟妹之间求得平衡。我国传统文化崇尚家庭本位观念,强调家庭的整体性以及个体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倡导家庭利益先于个体利益,并将家庭责任视为与个体生命始终相随的最重要的事情^[30]。因此,第一代大学生实施代内帮扶是渗透在文化基因里的天然使命与内在情愫。然而,成长于现代社会的第一代大学生也深受个体本位观念的影响,追求个体价值与权利的最大化,主张家庭成员彼此相互独立,拥有各自的生活空间^[31],这使得他们时常面临来自个人责任的权衡与考量——“卸责”与“担责”的纠结与烦恼,以及家庭矛盾与危机生成的难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第一代大学生在接受家庭供养、实现自我上升性流动之后,具备了回馈

家庭的能力与条件,在家庭本位观念的驱动下开展使代际和代内全员受益的代内教育帮扶,这也是第一代大学生构建家庭共同体的特有方式;另一方面,现代教育制度是以个体为单位的人才选拔与培养,并不强调家庭责任和奉献的观念,而代内教育帮扶往往需要第一代大学生担当更多的家庭责任,甚至需要自我牺牲式的家庭奉献,再加上帮扶弟妹与自我实现难以并轨,使得第一代大学生面临更艰难的行为抉择与心理冲突。此外,认同个体本位观念的弟妹可能将学业视为自己的事情,不愿被兄姐管教;而持有家庭本位观念的父母则对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寄予厚望,希望借助代内帮扶让家里再出一个大学生。这种相悖的价值观导致家庭共同体难以形成,教育帮扶合力较弱,进而诱发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且往往难以消解。

故而,第一代大学生实施代内教育帮扶是以家庭本位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经由家庭结构性压力和先天性位次而做出的价值选择。其表层目的是增加弟妹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深层目的是通过教育帮扶实现家庭整体的向上流动,改变家庭经济文化双重贫困的现状,为家庭而奋斗是其实施代内教育帮扶的优先价值考量。但是,深受个体本位的现代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帮扶之中也会陷入家庭整体发展与个体自我实现难以权衡的困境,因家庭负荷过重而自我发展受阻,教育帮扶造成的消极影响甚至占据主位。此外,所有家庭成员都是相互依存的,仅凭第一代大学生一人之力很难做好代内教育帮扶,更难以使之发挥出应然的积极效应,弟妹配合与父母参与同样不可或缺。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超越父代教育支持的局限性,激活上大学兄姐的独特优势,不仅使同代家庭成员获益,改善了家庭内部教育环境,而且促进了微观层面教育公平的实现。本文聚焦于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结果,辩证地探讨了代内教育帮扶产生的积极效应和衍生的非预期后果,旨在深入考察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现象。从积极效应上看,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有助于弟妹享有教育增益,减轻父母的教育负担,促进自我提升。就非预期后果而言,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使弟妹形成路径依赖心理,父母过度转移责任而变成甩手掌柜,其自身也因家庭负荷过重而发展受阻。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复杂影响揭示出家庭内部缺乏有

效协作,教育帮扶合力尚未形成,第一代大学生身心负荷过重,家庭甚至成为他们发展的拖累。据此,一方面,要发挥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积极作用,肯定第一代大学生在衔接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以及代内教育与代际教育等方面的作用与贡献;另一方面,要重视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衍生出的非预期后果,明晰代内教育帮扶的困境,规避其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分析与讨论

1. 代内教育帮扶是家庭形塑个体教育轨迹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研究丰富了教育社会学领域既有研究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分析和考察,将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视为补偿父母文化资本不足的必要行动,认可代内教育帮扶在家庭形塑个体教育轨迹方面的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聚焦于文化资本的垂直向下传递(代际:从父母到子女),忽视了文化资本的横向水平传递(代内:从兄弟姐妹到兄弟姐妹)的可能性。此研究范式源于以詹姆斯·科尔曼为代表的学者,其社会资本理论奠定了家庭教育领域的研究基调。科尔曼主要关注社会资本代际间的向下传递,认为资本是由父母传递给子女,年长一代供给年轻一代,兄弟姐妹是父母时间和注意力的额外索取者,稀释家庭资本的有限储备^[32]。此外,建构于文化从父代到子代一脉相承的同质性预设基础上的文化资本理论逐渐引领风尚,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父代的文化资本传递差异再制了社会的不平等,认为下层社会阶层文化缺损的原因在于未从父代接收文化资本^[33]。显然,科尔曼和布迪厄都将父母为代表的家庭资本视为个体教育获得的重要保障。在这种主流意识的指引下,兄弟姐妹在家庭内部建立和分配资源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很少得到承认。具体到教育层面,学者们普遍将代际教育支持视为家庭形塑个体教育轨迹的有效途径,而对代内教育帮扶缺乏应有的关注。

兄弟姐妹之间的影响可能超越父母对子女的影响^[34]。将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性影响纳入家庭研究,可以提供有关家庭动态以及家庭如何作为社会系统运行的新见解^[35]。但令人惊奇的是,关于第一代大学生的既有研究,乃至关于农村大学生的既有研究,或基于劣势视角分析这些群体的发展问题,或过多地停留于进入大学后学校环境给他们带来的发展问题,而他们对于家庭的反哺与贡献,以及家庭对于他们在校期间发展的影响,皆被选择性地忽视^[36]。事实上,第一代大

学生始终与家庭存在粘连关系,家庭是其难以割断的亲缘联结,他们将大学学位视为获得社会地位以及给家庭带来荣誉和经济贡献的重要基石^[37],在进入大学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回馈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家庭命运的“先改写者”,潜在地改变了家庭生活性质、家庭行为模式和家庭教育环境,为改善家庭高等教育赤贫状态做出贡献^[38],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证实。此外,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折射了代内以及代际的教育溢出效应,即上大学兄弟姐妹给作为“后继者”的弟妹带来丰富的教育资源,改善了其教育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母文化资本之不足,同时也反向促进了自我提升。

2. 第一代大学生以爱之名帮扶却陷入爱的烦恼

本研究拓宽了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视角,将家庭道德责任引发的教育帮扶冲突问题纳入大学生发展的过程,深入考察了家庭可能给该群体带来的发展困境和情感阵痛。换言之,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暗含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教育挤压效应,第一代大学生以爱之名帮扶却难以摆脱“甜蜜的烦恼”。已有研究表明,尽管第一代大学生进入高校之后与家庭存在空间距离,但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依然完整,其对家庭的忠诚和责任优先于对学校的承诺。在某些情况下,家庭关系的维系对于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同样重要,与家庭保持密切联系是第一代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重要保障^[39]。此外,第一代大学生家庭强调家庭本位观念的文化特征,当他们进入大学时,往往被寄予更高的家庭期望,并被要求定期回家履行某些职责,如照顾兄弟姐妹或共度家庭时光^[40]。然而,家庭责任与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并不相容,且使其承受更大压力,影响他们的学习技能发展、课堂出勤率、师生互动、学习成绩以及学业满意度^[41]。

故而,对于第一代大学生来说,家庭责任与承诺乃是一种爱的负担。一方面,他们无法摆脱家庭经济背景带来的先赋性劣势,面临学习基础薄弱、学业压力大、适应不良等问题^[42];另一方面,作为率先挣脱家庭经济文化双重贫困枷锁的第一人,第一代大学生责无旁贷地承担着来自父母的教养职责、家庭发展的天然使命,甚至成为父辈教育的代理人。这种因家庭承诺带来的代内教育帮扶对于第一代大学生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更是难以摆脱的困顿与烦恼,他们需要为此付出发展性代价,将个人利益让位于家庭整体利益,甚至需要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帮扶弟妹。而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家庭本位观念与个体本位观念的碰撞,更是加剧了第一代大学生“以爱之名”的家庭帮

扶与“为己发展”的价值追求之间的冲突和失衡。第一代大学生被推到代内教育帮扶者的位置,被迫承担起教育帮扶弟妹的责任,这是由他们的出身顺序和教育获得所决定的,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公”,但其中也夹杂着父母无法给予子女增益的文化资本之无奈,亦暗含着仅有的“先改写者”补偿文化资本之可能。于是在个体-家庭的冲突博弈下,实施代内教育帮扶成为第一代大学生的必然选择。

3. 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创造了微观层面促进教育公平的新路径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一直是我国教育领域的现实难题。第一代大学生给底层家庭的教育带来希望,有助于实现家庭教育再造^[43]。在本文中,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故事诠释了微观个体与宏观叙事的深度融合,通过代内教育帮扶,实现个体与代内、代际的亲缘联结,贯穿家庭和社会的共同期许,以此建立个体成长、家庭教育再造与社会公平的通道与路径。而这亦是新时期人口结构变革、多子女家庭增多、家庭教育理念变迁背景下,寻求促进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拓宽教育公平的侧面与缩影。显然,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可以且应当成为新时代家校合作、探索家庭教育发展的新方式,它为从微观层面实现教育公平提供了可行的实践路径,亦是弥合社会结构性教育差距的重要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是有边界与限度的。代内教育帮扶只是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的补充与拓展,而不是责任替代与转嫁,必须承认第一代大学生在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有限性。父母和弟妹不应是代内教育帮扶的坐享其成者,而应共同参与,形成教育帮扶合力。通过第一代大学生牵头、弟妹发挥主观能动性、父母积极配合、学校提供发展支持,各方合力共筑代内教育帮扶的坚实堡垒,协力促进家庭教育再造,促进高等教育公平,让更多来自底层家庭的学生共享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红利”。

总的来说,本研究为进一步理解第一代大学生与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经验支持,将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置于家庭本位的传统文化与个体本位的现代文化相碰撞的中国情境下进行考察,呈现了新时期第一代大学生所面临的道德观念和行动抉择困境。这有助于深度描摹我国第一代大学生的形象,诠释微观层面促进教育公平的新路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研究在数据收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囿于客观条件限制(如疫情以及受访者父母不便接受访谈等),笔者并未从受访者父母那里直接获取有关代内教育帮扶对其影

响的访谈资料。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对父母产生的影响,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是双向关联的,侧面收集的资料亦是不可或缺的数据来源。换言之,从第一代大学生的视角间接考察父母对教育帮扶的感受也可作为三角互证的重要支撑材料之一。由此可见,父母视角并未从根本上缺失。这也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即未来的研究可以直接获取父母的调查资料,通过弟妹、父母和兄姐的话语分析更直观地考察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

注释

- ①尽管学界对第一代大学生的定义尚有争议,但都将父母的最高教育水平作为“第一代”地位的参照系,认为第一代大学生的父母没有大学教育相关的经历。因此,本文将第一代大学生定义为父母双方均未接受高等教育、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大学生。
- ②我国从1980年开始全面实施“一孩”政策。部分农村地区从1984年开始采取“一孩半”政策,允许农村居民在第一胎为女孩的情况下生育第二胎。此后,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逐步从“一孩”向“二孩”“三孩”政策过渡。我国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地区性差异,有些地区的居民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因此,多子女家庭在我国仍然占据一定比例,特别是在多数农村地区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弹性较大的地区,这为本文考察第一代大学生代内教育帮扶的影响提供了便利。

参考文献

- [1]信阳师范学院. 奇缘! 姐弟师院同追梦,一家人都是老师! [EB/OL]. (2021-10-05) [2021-10-10]. <https://mp.weixin.qq.com/s/9vmBaS4sQs9cPFAzJW1Lig>.
- [2]DUNN J. Siblings and socialization[G]//GRUSEC J E, HASTINGS P D.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7: 309-327.
- [3]ZHANG Q F. The strength of sibling ties: Sibling influence on status attainment in a Chinese family[J]. Sociology, 2014, 48(1): 75-91.
- [4]SMITH C M. In the Footsteps of Siblings: College Attendance Disparities and the Intra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dvantage[J]. 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2020, 6(2):1-14.
- [5]DUMAIS S A, WARD A. Cultural capital and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uccess[J]. Poetics, 2010, 38(3): 245-265.
- [6]LUEDKE C L. Developing a College-Going Habitus: How First-Generation Latina/o/x Students Bi-directionally Exchange Familial Funds of Knowledge and Capital within Their Families[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20, 91(7): 1028-1052.
- [7]张文宏, 栾博. 同胞结构、代内文化资本传递与教育获得[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9):230-239.
- [8]BOUCHEY H A, SHOULBERG E K, JODL K M, et al. Longitudinal links between older sibling features and younger siblings' academic adjustment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 Psychology, 2010, 102(1): 197-211.
- [9]SEAMAN P, SWEETING H. Assisting young people's access to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families: A qualitative study[J].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04, 7(2): 173-190.
- [10]STEPHENS N M, FRYBERG S A, MARKUS H R, et al. Unseen disadvantage: How American universities' focus on independence undermines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2, 102(6): 1178-1197.
- [11]黄灯. 大地上的亲人: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 17.
- [12]程猛, 康永久. 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 “懂事”及其命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5): 68-75.
- [13]刘娜. 社会流动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分析: 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9(4): 119-131.
- [14]田杰. 先“上”带后“上”: 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代内帮扶教育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5): 62-70.
- [15]DAVIES K. ‘Sticky’ proximities: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education[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9, 67(1): 210-225.
- [16]BLAKE J. The only child in America: Prejudice versus performance[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1, 7(1): 43-54.
- [17]张克中, 陶东杰, 江求川. 中国农村子女教育同胞竞争效应研究[J]. 教育与经济, 2013(6): 44-53.
- [18]KALMIJN M, VAN DE WERFHORST H G. Sibship size and gendered resource dilution in different societal contexts[J]. PLoS One, 2016, 11(8): e0160953.
- [19]钟粤俊, 董志强. 更多兄弟姐妹是否降低个人教育成就?——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财经研究, 2018, 44(2): 75-89.
- [20]CEJA M.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parents and siblings as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college choice process of Chicana students[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06, 47(1): 87-104.
- [21]VALENZUELA A. Gender roles and settlement activities among children and their immigrant families[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9, 42(4): 720-742.
- [22]AGUIRRE J, MATTA J. Walking in your footsteps: Sibling spillovers in higher education choices[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21, 80: 102062.
- [23]袁璐璐, 罗楚亮. 兄姐上大学对同胞高等教育获得的溢出效应[J]. 财经研究, 2021, 47(5): 79-93.
- [24]LAWSON D W, MACE R. Siblings and childhood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or a later-born advantag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0, 70(12): 2061-2069.
- [25]聂景春, 庞晓鹏, 曾俊霞, 等. 农村儿童兄弟姐妹的影响研究: 交流互动或资源稀释? [J]. 人口学刊, 2016, 38(6): 5-16.
- [26]齐燕. 家庭伦理视角下农村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基于甘肃会县高山村“大学生成窝”现象的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1): 21-28, 45.
- [27]DUSTAN A. Family networks and school choi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4: 372-391.
- [28]DELGADO V. Decoding the hidden curriculum: Latino/a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nfluence on younger siblings' educational trajectory[J]. Journal of Latinos and Education, 2020(3): 1-18.
- [29]PIKE G R, KUH G D.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A comparison of their engagement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5, 76(3): 276-300.
- [30]杨善华. 家庭社会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4.
- [31]李桂梅. 现代家庭伦理精神建构的思考——兼论自由与责任[J]. 道德与文明, 2004(2): 58-62.
- [32]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S95-S120.
- [33]贺晓星. 教育·文本·弱势群体: 社会学的探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248.
- [34]BROOK J S, WHITEMAN M, GORDON A S, et al. The role of older brothers in younger brothers' drug use viewed in the context of parent and peer influences[J].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990, 151(1): 59-75.
- [35]MCHALE S M, UPDEGRAFF K A, WHITEMAN S D.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influence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2, 74(5): 913-930.
- [36]田杰, 余秀兰. 从赤字视角到优势视角: 第一代大学生研究述评[J]. 重庆高教研究, 2021, 9(5): 106-118.
- [37]BUI K V T.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at a four-year university: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reasons for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first-year experiences[J].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2002, 36(1): 3-12.
- [38]O'SHEA S. Filling up silences—first in family students, capital and university talk in the ho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2015, 34(2): 139-155.
- [39]BRADBURY B L, MATHER P C. The integration of first-year,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from Ohio Appalachia[J]. NASPA Journal, 2009, 46(2): 258-281.
- [40]TSENG V. Family interdependence and academic adjustment in college: Youth from immigrant and US-born families[J]. Child Development, 2004, 75(3): 966-983.
- [41]ALAMI M. Causes of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among Omani Stu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6, 4(1): 126-136.
- [42]陈乐. “先赋”与“后生”: 文化资本与农村大学生的内部分化[J]. 江苏高教, 2019(8): 39-46, 118.
- [43]GIST-MACKEY A N, WILEY M L, ERBA J. “You're doing great. Keep doing what you're doing”: socially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during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ization[J].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2018, 67(1): 52-72.

收稿日期: 2022-01-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我国农村教育观念、观念变迁及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研究”(BAA170019)

作者简介: 田杰, 女, 河南项城人,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余秀兰, 女, 安徽泾县人,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和教育社会学研究。